

苏轼诗歌研究

王洪 著



1207.22
54
/

王洪 著

苏轼诗歌研究

069599

朝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38 号

责任编辑: 田 英 陈荣霞

总体装帧: 韩 兵

封面题字: 林 岫

版式设计: 王瑞玲

责任排版: 王瑞玲

苏轼诗歌研究

王 洪 著

出版者: 朝华出版社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编 100044)

印刷者: 北京市平谷玉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10.50 印张 238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54-0210-2 / I · 0036 印数 0001-4000

平装 定价: 8.00 元

ISBN7-5054-0263-3 / I · 0064 印数 0001-2000

精装 定价: 10.80 元

序

朱靖华

读了王洪同志的这部专著，我认为他在苏轼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颇具功力和开拓性。

这部书希图对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诗歌创作，包括他的思想导向、艺术个性、审美观念、表现特征和创新精神等，进行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苏轼不仅是北宋诗坛的著名大家，同时，还是宋诗体制的奠基人，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把苏轼的诗歌创作特征研究透彻，则可基本窥见宋诗的概貌及其特征；将其众多创作实践中的艺术成果，提高到理论上加以阐释和总结，则可从中取得有益的借鉴，更好地认识诗歌发展的规律，从而推动和发展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新诗创作。

首章论述苏轼的“野性”，这是研究苏轼思想个性的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课题，也应该是一个研究重心。目前学术界一些论述苏轼思想和人生态度的文章，多是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出发，探索它们存在的多寡比重；或说苏轼的思想是儒、释、道的“混合”（或“杂糅”）；或说儒家思想是其主导，释、道只是在他仕途坎坷中进行自我精神慰藉的手段；或说苏轼在仕途建功立业时期是以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为主导，而在遭贬黄州乃至惠州、儋州时期，则以佛、道消极遁世思想为主导。如此等等，说法纷纭。我认为，探索作为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儒、释、道家对苏轼人生观和社会意识的

影响，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苏轼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里，他必然要受到他所处封建社会诸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陶铸；但是，“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除了受到周围社会生活条件的支配和影响外，还有一个能够接受这些影响的自我个性的主体。从这个主体的特性出发，他或者接受诸外部条件的此种影响和彼种影响，或者因时因地又发生相反的变化，形成为一个多维的、复杂的个体。没有这个个体核心的存在，一切影响都将成为空谈。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要把握苏轼个性的精神本质，要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去挖掘和探索他的内心世界的特征。决不能把苏轼丰富复杂的个性及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发展，纳入到一个固定的简单的数理模型中去进行定量分析。这样，将很难把苏轼作为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物进行观察分析，也很难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作为“社会结合的主人”，他是一个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个别的、独特的丰富个体。他的社会意识既是综合的，又更具有鲜明的个体色彩。否则，如果不是从这个个性主体出发看问题，那么，生活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同样都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他们岂不都被湮没了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而成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仅呈现出非本质影响的多寡主次差别的类型人物了吗？

儒、释、道作为人体个性的外部事物，它们各具有独立的思维体系，它们各自有其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因而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它们对苏轼发生影响，便决不可能是整体性的影响，而只能是个别的、片断的、局部的。就是说，苏轼接受它们的影响，是

有条件的，是从他个性禀赋的特质中去批判地吸取、补充他自身的需要的，有可能得到发展并转化为他自身特质一部分的事物。否则，情况将会完全相反。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意识统治下，儒、释、道对人的异化和反异化的斗争，是十分激烈而尖锐的。人性的异化到复归的过程，几乎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如苏轼在经历了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儒、释、道陶铸斗争过程之后（或陶铸过程中），他曾十分清醒地说过：“儒者多空文而少实用”^①；“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②“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所以苏轼对儒、释、道都采取了批判吸取的态度，他说：“独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③他对万物，都是“尽自然之理，而断乎其中”^④的，他主张要“甚有得于中而张于外”。不然的话，就会“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⑤因此，苏轼对待外部影响的态度，可说是一个十分清醒的“主体性”论者。

从来，儒、释、道并不能桎梏一个真正的人，除非人们把它们当作宗教迷信的“神”来加以崇尚，但即使是“神”，也不能完全窒息人的个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神就是人。人只需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估计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

①苏轼《答王庠书》。

②《庄子祠堂记》。

③《与滕达道书》。

④苏轼《上曾丞相书》。

⑤《与李方叔书》。

上, 打开另一条路, 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途径。至于苏轼的“野性”如何具体地与儒、释、道思想对立统一、发生联系和密切结合, 又怎样在不同社会现实矛盾条件中得以发展和转化, 以及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又怎样富有个性地表现出他的侧重点等等, 这还有待于广大有识见的学者专家们进行探究和阐发了。

以下第二章至第六章, 则集中在苏轼诗歌的艺术造诣方面的研究上。分别论述了苏轼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尚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诸方面的创作实践和艺术特征, 并从理论上阐释了苏诗在艺术开拓上的意义及其革新价值。在苏诗这些特点的研究方面, 海内专家学者已有所论述, 但如何把这诸方面特征相互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如何在宏观上从社会渊源和文学发展规律方面深入探追, 在微观上从诸特点与诗歌艺术特质的关系上, 以及挖掘苏诗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个性方面进行研究, 还略嫌不足。本书的这些篇章, 就是试图从这些领域内进行阐发和论述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一点是: 概括苏诗的五大特点, 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尚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等, 都是采用了古代某些理论批评家的贬义语而确定下来的, 这样做是否有损于苏诗的威望和贡献, 或未能确切地概括出苏诗的真正特征? 我以为是不会的。

文学史上经常发生这样一种奇异的现象, 即当某时期的个别杰出文学作家, 以他无比的才华和旺盛的创造力及开拓精神, 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一种崭新的未知事物时, 或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蜕变出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法时, 往往会遭到当时或稍后一些人的挑剔和歧视, 甚至会被视为异端而

665690

加以排斥。因为这些人总是用现成的公式、因袭的观点、过时的理论去解释它，感到包容不下时，便发出了种种的惊叫。而这种种惊叫，却又往往突出地表现出这些批评家们的无比锐敏性，他们站在反面立场恰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住开拓者的某些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在批评者看来，当然是属于贬意的。但殊不知，正是由于他们批评的锐敏性和准确性，却在客观上恰正显现了这些开拓者的新特征、新成就，逐渐转化为正面的艺术概括。这在文学史上已经不乏其例了，如宋人陈师道通过对杜甫、韩愈乃至苏轼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的批评，以及严羽对苏、黄、宋诗的“以文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和“尚理”的批评，都以其锐敏而准确地指出了诸诗人的创作特点，而被后人借用，给以新的评价，赋予新的含义，做了正面的肯定。——这一点正可启示我们：历史上不论是下面的批评或反面的批评，只要它们具有科学的内涵，都将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而本书作者敢于面对这些千百年来聚讼的“老大难”问题，以宏观博大的视角，把这些文学现象置放在诗文流变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并紧紧扣住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质，列举丰富的例证资料，给予精密严谨的理论探讨，从而较科学、系统、全面地阐发了自己独特的、颇具说服力的论点。对解决文学史上的千年疑案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其中“以议论为论诗”，颇发前人所未发。作者超越了学术界解释“意境”所局限的“意与境的统一”和“情景交融”的意象式艺术论点的樊篱，以宏观的视角、翔实的材料、严谨的考察，有力地论证了意境乃由意象式和非意象式两种艺术所构成，并分别命名为“情境”和“物境”，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自己的正面论点，阐发了以直抒胸臆为特征的诗作的美学评价问题（包

括对苏轼“以议论为诗”的评价)，而具有开拓意义。

总之，作者这六章相互补充、相互辉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苏轼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是为序。

1992年岁暮于中国人民大学

前言

这部书稿，是我七、八年前的习作，其中《苏轼“以议论为诗”论》是我的硕士论文。将这部书稿印成铅字，是我当时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今，在我早已将它淡忘的时候，它却有了问世的机会。这使我平添了几分感慨。

今天，当我重读此稿时，自然会有许多批评，许多不满，因为，这七、八年来，我不可能还在当年的阶段踏步。读过拙文《中国文学宝库·总序》，或是读过拙著《中国古代诗歌历程》的诸位先生，当不难看到这一点。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现在的种种观点，如中国文学的分期、唐宋诗词的嬗变等，又无不是从对苏轼的研究起步的。所以，可以说，这本《苏轼诗歌研究》，正是我现在学术观点的源头。

这也是我愿意翻出这本不成熟的书稿，呈献给各位读者的原因。

在这部书稿付梓之时，我应该特别提到我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先生。这部书稿，是在朱先生的指导、教诲下写成的；以后，朱先生又通读了全稿，给予了很多指导；现在，在百忙之中，又为此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在此，学生谨向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3年是个收获之年。我感受着收获的喜悦，冀盼着来年的收割，祈祷着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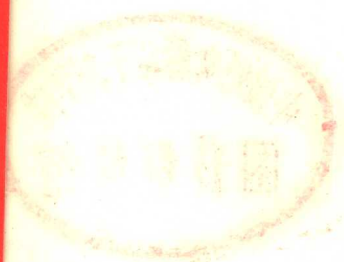
王 洪 1992年12月15日

于北京玉渊潭畔



作者像

00239



目 录

第一章 苏轼“野性”论	1
一 “野性”的萌生期	6
二 “野性”的发展期	8
三 “野性”的形成期	17
四 “野性”的反思期	30
五 “野性”的成熟期	43
第二章 苏轼“以文为诗”论	50
一 “以文为诗”产生的宏观认识	52
二 诗与散文关系的探讨	61
三 苏轼“自然艺术”美学思想的简单探讨	68
四 苏轼“以文为诗”艺术实践的考察	76
(一) 在字法方面的“以文为诗”	77
(二) 在句法方面的“以文为诗”	85
(三) 在章法结构上的“以文为诗”	94
第三章 苏轼“以议论为诗”论	108
一 苏轼“以议论为诗”与“意境”说的关系	112
二 苏轼“以议论为诗”所形成的“情境”	127
三 苏轼“以议论为诗”与“艺术抽象”的关系	135
四 苏轼“以议论为诗”所形成的“艺术抽象”	143
五 苏轼“以议论为诗”产生原因的探讨	157
(一) 苏诗“情境”产生原因的归纳	157
(二) 苏诗“艺术抽象”产生的宏观认识	164
(三) 苏轼的“神似”理论	168

第四章 苏诗“尚理”论	178
一 宋代社会与“尚理”关系的探讨	179
二 苏诗“尚理”的艺术特点	182
(一) 寓哲理于意象, 以意象象征哲理	183
(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理”在“意象”中	186
(三) 简议议论在其中的作用	196
第五章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205
一 “以才学为诗”产生原因的探讨	205
二 “以才学为诗”的理论探讨	210
三 苏轼“以才学为诗”的理论和艺术实践	212
第六章 苏轼“以文字为诗”论	219
一 简议苏轼“以文字为诗”的产生原因	221
二 苏轼“以文字为诗”的艺术实践	223
(一) 对“和韵”的探讨	224
(二) 对所谓“戏”字的考察	230
(三) 对“回文诗”、“谐隐诗”、“神智体”、“谜语诗”等的思考	233
三 小议文学与游戏、娱乐的关系	237
结束语	241
附录一 试论《东坡志林》的写意艺术	245
附录二 苏轼诗词注译	260
游金山寺	260
饮湖上初晴后雨	263
百步洪	264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选一)	267

江城子	268
水调歌头	270
定风波	272
念奴娇	274
水龙吟	276
临江仙	279
蝶恋花	280
附录三 苏轼诗词赏析	283
和子由澠池怀旧	283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284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288
东栏梨花	289
舟中夜起	291
淮上早发	294
汲江煎茶	295
倦夜	298
行香子	299
虞美人	302
浣溪沙	304
卜算子	305
定风波	308
西江月	310
蝶恋花	312

第一章

苏轼“野性”论

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思“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那么，苏轼的诗歌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珍品，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点呢？

如果以宏观的目光寻求这一个“点”，无疑，应该从苏轼的人生观、美学观来觅取。因为，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过是诗人人生观、美学观的艺术实践而已。

本章所要论及的苏轼的“野性”，正是在研究苏诗之前，所必然要涉及的有关苏轼的人生观、美学观，其中包括对诗人的个性、气质、心理、人生观念、美学追求，以及诗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探讨。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影响尤为突出，这在诸专家的论述中，早有论及。但是，在苏轼的人生观中，还有一个更具有本质含意、更能显示苏轼个性特征和进步意义的思想内涵，那就是他的“野性”表现和“野性”追求。“野性”作为苏轼的人生观，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密切相关，但又并非三家思想的简单的中和。“野性”就其原意来说，只是苏轼个性、性格的概括。苏轼的这种个性、性格在与时代、社会发生矛盾时，就更需要借鉴儒、

释、道的哲学思想，换句话说，是借鉴与“野性”性格合拍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从而形成苏轼的完整人生观——“野性”。这是我在具体阐述之前，对“野性”所做的一些说明。

在欣赏苏轼的作品时，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苏轼极爱使用具有“野性”情趣的意象。仅从熙宁时期的诗作中，我们就能多次地看到“野鸭”、“野鹑”、“野凫”、“野菊”、“野桔”等这样一些具有野味意象的诗作。如《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君亦见寻于湖上，以诗见寄，明日，乃次其韵》一诗：

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脉脉。
娟然如静女，不肯傍阡陌。

“野芙蓉，指拒霜花也”（见《苏轼诗集》合注）。诗人在另一首诗中曾歌颂过此花：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应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歌咏野芙蓉在众花凋谢之时而独自芬芳，从而深含了诗人独立危行、高驰不顾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苏轼的性格、品性——苏轼的“野性”具有内在的联系。

苏轼也爱称自己是野人：“野人疏狂逐钓舟”（《再和》），“市人行尽野人行”（《东坡》）。他不仅描绘自己穿着野服：“黄冠野服山家客”（《赠写真何充秀才》），更重要的是，他